

清晰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

——以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为例

麻 国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民族”与“族群”最基本的涵义都是指人们的共同体，是对不同人群的分类。但是，当学者将“民族”与“族群”这两个词汇纳入历史经验与社会现实中加以研究时，其内涵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有其不同的表述和意义所在。在学科史上，“民族”作为一个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关键概念之一见诸各门社会科学，被赋予了多重涵义，尤其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些概念，将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甚至文学等学科牵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当基于西方社会经验建构的“民族”概念及相关理论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中国人对“民族”及其相关理论涵义的理解、诠释与实践本身又形成了一套与国际背景、国内政治、社会文化的特点等相联系的社会思潮和历史事实。概括起来“民族”概念的发展变化其实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适应的过程。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民族”有着相对明确的定义，指具有相同文化属性的人们的共同体（ethnos），文化是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之一。人类学对人们的共同体本质及关系的理解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古典人类学将非西方社会的整体作为“他者”，以“异文化”为研究旨趣，热衷于跨文化比较研究，并没有将某个具体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现代人类学建立之后，虽然马林诺斯基式的科学民族志将某个具体的民族体为描述对象，但是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于探寻社会或文化的运行机制，而对“民族”本身的概念加以讨论没有形成研究的思潮。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诞生了“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人类学开始将不同群体的关系等问题作为研究专题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人类学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一般来说，族群（ethnic group）指说同一语言，具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对于其它的人们具有称为我们的意识的单位，不过，这个族群单位中的所有的人们并非都拥有共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而「认同」是存在于个人与某特定族群间的一种关系，它属于某特定的族群，虽然族群中的成员可能散居在世界各地，但在认同上，他们却彼此分享着类似的文化与价值观。而民族或族群认同是认同的典型表现。

由于中国大陆1949年后的基本社会制度、社会科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特殊历程，使得“民族”在中国大陆成为明确存在的实体概念，各个“民族”成为中国大陆民族学研究实践中明确的研究对象；相反，较晚近引入中国人类学界的“族群”概念及相关理论却在中国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有些争论已经超越了对族群理论的讨论，上升为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究的反思，甚

至涉及到对国家话语下的“民族”的再认识。这也导致“族群”的概念被赋予了一种暧昧的意味。“族群”成为了一个弹性极大的概念，与之相关的学术成果汗牛充栋。针对这一研究现状，本文将不参与中国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界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讨论，而是通过对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关于“民族”或“族群”的研究实践进行梳理，在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把握关于“民族”与“族群”的研究。

一、“多民族中国”构建过程中的“民族”的理解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是近代由海外传入中国的新词汇。1902年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²“中华”本是部分中国人的自称，与“华”相对的是生活在周边地区的“夷”，这是古代中国对人们的基本分类。在儒家思想中，华夷虽辨，但绝非对立，孔子强调“有教无类”，华夷只是文化上存在差异，如果“夷”能够遵从儒家思想，那么“夷”自然就成为中华的一员了。秦汉之后，虽屡经王朝更替，但中国人对人类划分的基本认识没有太大变化。历史学者的研究认为，大略而言，历代汉族政权强盛时，常常是以文化优劣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反之，季世势衰，则转而强调血统的传承，以“坚夷夏之防”。³直到西方列强叩开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中国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受到严峻的挑战。一些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先从器物，进而政治，再而思想上开始学习西方，救亡图存。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的一连串的失败，尤其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八国联军侵华，更是刺激了国人的思想。“民族”这一概念也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政治思潮涌入中国。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族概念首先由梁启超提出。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⁴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⁵同年，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率先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他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因为它“不使他族侵我之自

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1页。

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3 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35-60页。

4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94、96页。

5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1—12页。

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对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梁启超极力提倡民族主义的原因便在于此，他要求国人迅速培养民族主义，以抵御欧美的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谓：“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⁶梁启超认为建设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救中国的唯一法术⁷，并明确提出于“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⁸以民族国家救国的思想广为中国的知识界所接受，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勃然兴起。

此后在 20 世纪初期，“国家”和“民族”等词已经被普遍使用。在当时的思想、文化、政治领域比较活跃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章太炎、孙中山、汪兆铭等，都使用并论述了“民族”一词。⁹与梁启超不同，这些思想家更加关心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但他们与梁启超的目的是一致的，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都是在国民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认识“民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从以排满为手段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到建立“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便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华民国创立后，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显赫的思潮，并逐步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得到了进一步阐释。自 9·18 后直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族主义成为抗日救亡的一面大旗，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

无论如何，在 20 世纪前半叶，通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救国图存，成为了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与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构建努力相应的，也是进行学科建构的实践。要建构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说明“中华”民族在世界中的定位，还要了解中国境内诸多族体的情况，为“五族共和”确立实证根据。

自 20 世纪初到 1927 年前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将新的知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类发展的解释和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初步知道了民族、种族等现代民族学概念。¹⁰同时，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实地调查，并推出一些相关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幼稚，且非专门的民族志，但内容上已经开始超越以往传统中的华夷大防观念，不再把边疆少数民族看做夷蛮，而是视之为国人的一部分。¹¹1927 年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和学术研究体系的规范化，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吴文藻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人。他早年留学美国，1929 年归国

6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版，第 19—22 页。

7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版，第 35 页。

8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版，第 11 页。

9 周传斌，《中国民族理论新范式的探索》，中央民族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11 页。

10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97 页。

11 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0 页。

后向中国学术界广泛介绍西方社会思想和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其中尤其以对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与美国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方法的介绍为重。吴文藻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探索,并致力于人类学的实际应用,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最终形成了人类学的中国功能学派。早在1926年留美期间,吴文藻就发表了《民族与国家》¹²一文,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在文章中,吴文藻以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分析了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指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的缺陷,主张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他说:“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非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于而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¹³吴文藻的民族研究对费孝通、林耀华、黄华节、李有义、陈永龄等民族学人类学大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基于建设多民族同一国家的民族理论,面对国家疆土危机,吴文藻先生于1942年在《边政公论》第1卷中发表《边政学发凡》一文,确立了边政学研究框架的雏形。吴文藻在文章中指出:“边政学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实事、制度,及行政的学科”,¹⁴将人类学的民族研究直接应用于国家对地方和民族的行政实践中。

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一部分民族学、人类学者着力于理清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关系,为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提供依据。但另一部分民族学、人类学者却没有直接参与建构民族国家的讨论,他们的研究旨趣在于以“科学主义”的方法客观描述民族文化;重视对中国传统史料的挖掘,强调对社会文化事项的综合分析。这一研究倾向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凌纯声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凌纯声192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师从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等人,1929年获博士学位并回国,将法国民族学派的理论方法介绍到中国。《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奠定凌纯声作为中国现代人类学先驱的扛鼎之作,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科学民族志作品,在国内长久是民族学调查的范本。¹⁵全书共分上下两册及图版一册,图版依据正文有关文化事项的描述拍摄;正文除了描述赫哲人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文化生活,还整理了赫哲人的语言和故事。这种文化条列式的陈述相当程度的说明了其科学民族志实证论及经验论的立场,¹⁶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重视材料收集和详实描述研究理路。但是,在“客观记录”的背后,却蕴含着作者的某种理论预设。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凌先生纵横中国境内东南西北族群的古籍来对北方民族

12 吴文藻,《民族与国家》,《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9—36页。

13 同上

14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刊于1942年《边政公论》第1卷。

15 李亦园,《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1、432页。

16 何翠萍,《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几个个案谈“己”与“异己”的关系》,徐正光,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第366—368页。

的渊源做考证,征引中国境内所有地区关于宗教文化生活的文献与赫哲人宗教比较。这种论证方式预设了一个族群文化“同质”的前提,而这种前提完全是建立在中国典籍所划出的疆域范围内,所有民族或族群都可以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层面上进行考察。¹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凌纯声并没有直接界定中国的“民族”为何,却将中国传统的华夷分类思想与现代人类学思想加以融合,在自己的研究中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作为前提。

凌纯声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学派将中国史学研究传统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加以综合的研究倾向,在民族志的书写中表现了对中华民族统一性的理解。中国史学研究传统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结合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中国民族通史的撰写。中国民族通史的作者们借鉴西方的民族理论,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求索,在历史的书写中确立“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人类学家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¹⁸是中国民族通史撰写的滥觞,此后民族史研究专著主要有:张其昀《中国民族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1934年出版订正增补本)、常乃惠《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曹松叶《中国人民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中华书局,1935年)、柳贻徵《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郭维屏《中华民族发展史》(成都,1936年)、李广平《中华民族发展史》(正义出版社,1941年)、张旭光《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俞剑华《中华民族史》(国民出版社,1944年)、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光华出版社,1948年)等十多种。¹⁹在这些作品中,有的侧重于对中国各民族内部特质的研究,有的着眼民族关系的梳理,但都将“中国”境内历史上存在的各民族单位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

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家们或投身田野,或钩沉史海,在人类学

17 同上,第370—372页。

18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9 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三阶段》,《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总第13期),第1—8页。

吴怀祺,《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第4—13页。

瞿林东,《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河北学刊》第27卷第6期,2007年11月,91—94页。

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卷第4期,2007年7月。

屈直敏,《近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81期,2008年第3期。

张越,《中国近代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与撰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3期,2008年5月,第142—146页。

雷虹霁,《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20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黑龙江民族丛刊(季刊)》,2002年第4期(总第71期),第72—76页。

科的框架下阐释国家与民族、中华民族整体与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努力解决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建国论”在中国的困境。民族学人类学家的论说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观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和学术支持,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研究,从以开始就与国家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不能脱离现实政治考虑学术问题。

二、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实体的确立——论作为政治概念的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

宪法中的“民族”具有非常明确的所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五十六个民族,这五十六个民族统称“中华民族”,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其中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民族,其他 55 个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被明确的划归于这五十六个民族,民族归属是除姓名、性别、年龄外最基本的个人信息。

然而对五十六个民族实体的确认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民族的论述,把中国境内凡具有自己特征的族体统称为“民族”。²⁰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各民族“自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²¹但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了“民族独立”的危害,在强调民族平等的同时,在抗日的背景下更加强调各民族的团结。1938 年中共中央建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其成员在对陕甘宁边区和内蒙古西部地区进行调查后撰写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²²并提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1947 年在中国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既保障了民族自我管理,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和样板。²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一整套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策,具体表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章“民族政策”,²⁴其内容与

20 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6 页。

21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48 页。

22 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8—41 页。

23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61—262 页。

24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章》,载《民族政策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 年,第 1 页。

上文引述的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政策部分相比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了落实民族政策,1950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从1950年7月到1952年底,中央共派出四个民族访问团,成员既包括了高级官员,也有以费孝通、林耀华为代表的人类学、民族学家。派出中央民族访问的首要目的是宣传新中国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宣示新政权的成立;同时为了了解民族地区基本情况,中央民族访问中部分成员,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还在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为后来的民族识别奠定了基础。

民族识别指对自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群体进行甄别,以确认其是否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或归属与哪个民族,从根本上讲是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²⁵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但是在建国初期,没人知道中国境内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为了改变民族成份和族称混乱的状况,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各地地方上报的四百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界定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建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新中国中央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采用了斯大林在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²⁶这一定义有客观标准,始于操作;但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²⁷这是斯大林是根据欧洲国家的历史总结的定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因此在民族识别的进行过程中必须结合具体情况灵活把握。另外,为了突出对各民族的尊重,新成立的中国政府还强调各个族体的人们决定自己的族别问题,既“名从主人”。也就是说,民族识别既要以民族的客观特征为标准,还要考虑民族群体内部的主管意愿,更增加了民族识别过程的复杂性。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到1954年,为民族识别发端阶段,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其中27个是新确认的。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为民族识别高潮阶段,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第三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是民族识别受到干扰的阶段,确认了1个少数民族。第四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是民族识别的恢复阶段,确认了一个少数民族,并开展了广泛的民族成分恢复和更改工作。截止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正式确认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²⁸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人类学民族学相关理论在一些民族的确认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26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6页。

27 同上。

28 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73页。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参加过民族识别工作的黄淑娉教授总结道：“这里，问题的焦点是：仅仅具有“共同文化”的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能不能被认作一个民族。如果遵从预设的理论，逐条对照，只能得到否定的答复，这样，我国的许多民族都够不上作为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根据民族学的理论对族体存在状况的研究分析表明，构成民族特征的，一是共同语言，二是共同文化特点（广义而言，语言也包括在文化之中）；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民族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文化。我们当时充分考虑到斯大林对于‘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民族要素的论述，借鉴民族字的有关理论，决定以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共同文化特点作为识别民族的标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于是，一些并不同时具备四个特征的族体被缺认为民族。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处理常谦虚地以‘灵活运用’予以概括；今天看来，这正是对民族识别预设理论的重大突破。”²⁹费孝通先生对穿青人的识别和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确认，是人类学家参与民族识别的典型。

费孝通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到民族地区做过调查，他的民族学思想主要受吴文藻和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 С.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先后参加了中央政府派出的西南访问团和中南访问团，作为分团长前往贵州和广西的民族地区，在完成政治任务的同时收集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在日后的民族识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将民族识别分为两个过程阶段：首先“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³⁰在民族识别中，费孝通除了强调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尤其指出“民族这种人们的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³¹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费孝通先生将贵州省西北部的穿青人识别为汉族。费先生 1950 年率中央访问团到贵州时了解到贵州自报民族 30 多个，其中有十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与周围汉族基本相同，但要求以少数民族待遇。他们当中人数最多的是“穿青人”，约 20 万人口，认为自己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方面都有异于汉人的特点，是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认穿青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1955 年费先生对穿青人进行了实地调查。费先生首先进行历史考证，确认穿青人是明朝迁入贵州汉族移民的后裔，这些汉族移民虽然偏居中国一隅，远离汉文化中心地区，但由于与军队关系密切，仍保留了汉族的文化特征和语言。继而，费先生通过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穿青人与周围汉人的关系，穿青人与周围汉族的差别是汉族内部地方性的差别，穿青人自我认定为少数民族是由于后来定居的汉族人的歧视，而“这些差别和矛盾在汉族向现代民族发展过程中已在逐步消失。”³²最终确认穿青人是汉族的一部分。

29 黄淑娉，《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 期，第 107—116 页。

30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费孝通文集（第七卷）》，群言出版社，1999 年，第 199 页。

31 同上，第 202—203 页。

32 同上，第 202—203 页。

费先生对穿青人的认定是民族认定中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一个经典的研究个案，而潘光旦教授对土家族的确认则是单一少数民族认定的典范。潘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善于运用中国经典阐释社会科学理论，对民族问题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潘先生充分发挥了他融贯中西的研究风格，以《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³³一文一举奠定了土家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地位。土家人久居湘西，“土家”是他们对外的自称，直到20世纪50代都没有确定族别，还有人认为土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为了确认土家人的族别，潘光旦先生博览古籍、并深入湘西土家人聚居区进行调查后，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在“引论”开宗明义的指出：“‘土家’是现在绝大部分聚居在湖南省西北境龙山、永顺、保靖等县的一群非汉族的人民”，³⁴土家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全文既为论证这一观点而展开。在“前论”中，潘光旦先生通过分析史料，认定“土家”不是瑶，不是苗，也不是“獠”，理清了“土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正论”共十节分，前四节仍是历史分析，潘先生在考证古代正史、地方志、笔记等大量古籍文献后认为：“巴人与‘土家’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方面有若干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只是巴人与土家有，而其他人群，作为人群是没有的”，³⁵之后的五节潘先生将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进一步论证巴人与“土家”的密切关系。在“论据一——自称”一节中，潘先生论证了巴人与“土家”有着共同的自称；在论据二、三中，潘先生以虎为线索，发现巴人与“土家”有着共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征；潘先生以语言学分析巴人与“土家”的关系，认为巴人就是“土家”的祖先。最后一节，潘先生澄清了土家人与汉人的关系，证明巴人最终成了“土家”。

费、潘二人的研究个案表明，在民族识别的具体实践中，人类学、民族学家并没有教条的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界定民族群体，而是发挥自己各自的学术特长做出最终判断。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和各项具体民族政策的落实，各个被认定的民族内部结构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少数民族首先通过区域自治成为政治实体，而后在统一国家的框架下建构各自的文化特征，最终成为明确的民族。至1987年，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份工作已基本完成，³⁶“但有些遗留问题，必须解决好。涉及的人虽然不多，但情况复杂，难度较大”，³⁷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国大陆尚有“其他未识别的民族”749 341人，³⁸然而，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国大陆五十六个民族的格局最终确立。

33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载潘乃谷、潘乃和选编，《潘光旦选集（第二集）》，第309—480页。

34 同上，第311页。

35 同上，第358页。

36 黄光学，《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份工作已基本完成——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答本刊记者问》，《中国民族》，1987年第2期，第16—17页。

37 同上。

3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第三号）》，1990年1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index.htm>

三、民族、族群的“名实之争”——论作为学术概念的族群

20 世纪前半叶在中国大陆确立的学术体制被彻底打破,代之以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和社会科学体系。就人类学、民族学而言,人类学学科被取消,人类学、民族学者被重新分配工作,20 世纪 30、40 年代形成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区域特点和不同学派没有延续下来。与此同时,苏联民族学相关理论与学术专著被系统的介绍到中国。苏联民族学范式在中国大陆确立的过程的开始阶段,就存在着对民族“名与实”的讨论,但这些讨论都限定在新中国马列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1954 年,在《民族问题译丛》上还将“民族学”译为“人种学”。³⁹随着中苏学术交流的深入,很多苏联民族学专论在国家的专门机构的组织下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中苏学者实现了互访。苏联民族学的定义为:“民族学是历史科学的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用直接观察、科学记述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不同的族在人种和民族特征上,在他们的变迁发展上的文化生活的特点,从而解决各族的起源问题,使他们的迁移史和分布史得以复现”。⁴⁰后来尽管中苏交恶,苏联人类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判,但是这一定义仍对中国民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中国的民族学家强调民族是一个历史概念,解决了斯大林民族定义与中国民族现状的脱节问题。民族识别后,“民族”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治身份概念,各个“民族”实体成为了民族学明确的研究对象,民族学成为为民族政策服务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个特点集中体现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林耀华学术的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过程和性质:“1956 年,全国科学研究 12 年规划(草案)制订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各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积极开展工作,从 1959 年起陆续写出了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这些书稿和调查资料,对党的民族工作以及制订在民族地区如何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的方案,提供了依据或参考。”⁴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央政府直接组织的,其调查成果为国家服务。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了解决《辞海》修编中遇到的问题,“在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召开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讨论会和座谈会,诸如“民族学”、“民族”、“部族”等词的意义和内容问题,一些少数民族的族源和形成问题,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少数民族中若干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的讨论座谈会。”⁴²其中,林耀华认为“民族”、“部族”都是指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人们的共同体,而“民族学的对象很明确,就是研究各个不同时代的民族共同体,没有其他学科像民族学一样,专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从这点说民族学

39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95 页。

40 斯·普·托尔斯托夫,《苏联民族学的任务》,中央民族学院编辑部,《民族问题译丛——民族学专刊》,民族出版社,1956 年 6 月。

41 林耀华,《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 with 展望》,《民族研究》,1982 年第 2 期,第 48—55 页。

42 同上。

是具有独特性质的一门学科。”⁴³这一论断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可。

中国大陆的民族研究实际上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开始脱节。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方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逐步发展出关于族群研究的理论。实际上,早在 20 实际 20、30 年代,国外学者就表现出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浓厚兴趣。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关注出于不同的目的,大多没有中国人类学家构建民族国家的关怀,但是他们的研究对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十分深远,其中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研究成果尤其重要。史禄国早在 20 世纪 10 年代就对俄罗斯远东与中国接壤地区的“通古斯人”进行了人类学调查,并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用英文出版了《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⁴⁴。在书中,史禄国明确界定“北方通古斯人”是一个明确的“民族单位”。“民族单位”是指“这样一种单位,在这个单位中民族志要素的变化过程及其向下一代的传递和生物学的过程正在进行。这些单位永远处于变化(变异)的过程中,因此昨天的单位同明天的不会完全相同,但是从发生学来说它是相同的。”⁴⁵在这个定义中,对“民族志要素”的理解最为关键,史禄国认为“这些要素规定了作为持久的人们共同体的社会功能,这些要素所形成的复合具有某种内部的平衡关系,以使民族单位得到繁衍,并维持一定的经济制度、物质文化、精神和心理活动——亦即保证民族单位的存在和延续”⁴⁶费孝通先生在《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⁴⁷解读了史禄国“民族单位”,指出史禄国用拉丁原文 *ethnos* 指代“民族单位”,以避免与“民族(nation)”混淆;*ethnos* 与政治和“国家”没有关系,是具有相同自我认同的人们的群体。

有学者指出,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源于马克斯·韦伯。⁴⁸但西方学术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才开始系统的族群研究,最开始是讨论美国的少数族裔问题,后来在研究中拓展“族群”的概念,并以之讨论世界广泛存在的民族问题。在人类学界,逐渐形成了以族群为核心概念的理论范式,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很多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其中美国学者杜磊(Druc C. Gladney)对回族的研究以及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对羌族的研究。杜磊的代表作是《中国穆斯林》,⁴⁹其核心内容是四个回族社区的民族志描述,主旨在于讨论中国大陆“回族”的族群认同。在对西北回族乡村的民族志描述中,

43 林耀华,《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和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81 年第 3 期,第 51—61 页。

44 史禄国著,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

45 上书,第 11 页。

46 上书,第 9 页。

47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群言出版社,1999 年,第 75—91 页。

48 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7 卷第 5 期,2005 年 9 月,第 82—88 页。

49 Druc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Published b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1991, 1996.

杜磊突出了宗教复兴对当地回族穆斯林自身认同的作用；而在北京牛街，杜磊则看到了当地回族居民以清真饮食文化作为认同的标志。杜磊的突破在于将族群理论置于中国大陆的民族政策语境中，阐释了国家话语和自我认定如何共同塑造作为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的“回族”。王明珂的代表作为《羌在汉藏之间》⁵⁰《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⁵¹《兄弟传说与祖先崇拜》，⁵²在这些作品中，“文献史料被当做一种‘文本’（text）或‘述事’（narratives），以强调其背后的社会情景（context）与个人感情。”⁵³而作者进行的是历史记忆研究，“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context），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体系。”⁵⁴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王明珂的羌族研究被认为具有强大的“解构”力量，但是王明珂自己却认为，“无论是将当今中华民族视为一近代建构物，或说她是个有五千年光荣历史文化的民族，都过于简化了这个民族的本质及其形成之历史过程。”⁵⁵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杜磊和王明珂的研究也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很多争论，但其研究视角与理论诉求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重建，学术研究得到恢复，西方人类学各流派思想涌入。族群是最早引入的西方人类学概念之一，随即与“少数民族”这一概念纠结，并一起引发了争论。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大陆的民族学是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科，而且只有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使得民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民族的理解实际上决定了民族学的性质，是学科重建首要讨论的问题。在诸多讨论中，西方族群理论被系统的介绍到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界，学者们也在对概念的讨论中回顾和反思了中国民族学，并充分展示了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重建后学者寻找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建构新理论的诉求。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并没有拘泥于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而是在族群理论的视角下广泛开展田野工作，撰写民族志作品，其中黄淑娉教授领导的对岭南地区族群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黄淑娉教授争取到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主持研究“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课题，1994—1999年组织了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部分教师为主并包括校内外教师及研究生的队伍，在广东17个县市作实地调查，进行多学科（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综合研究，⁵⁶出版了《广东族

50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5月。

51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

52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53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

54 同上。

55 王明珂，《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55—67页。

56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网，网址：<http://home.sysu.edu.cn/human/jgry/Untitled-20.htm>

群与区域文化研究》⁵⁷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⁵⁸。在这项综合研究工程中,有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但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社会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对广东汉族“民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跨越“实在论”与“建构论”的“多元一体”

民族、族群的“名实之争”实际上表现了社会科学“实在论”与“建构论”的二元对立,费孝通先生1988年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超越了这种非此即彼的论述模式。费先生的“多元一体论”是吴文藻和史禄国民族研究的继承,更多的是费先生多年从事民族研究的心得,也是一个变化过程。费先生回顾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说,“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它的稳定性,但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有些互相融合了,有些又发生了分化。所以民族这张名单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民族识别工作也将继续下去”,⁵⁹20世纪80年代初期费先生又提出了“民族走廊”说,将历史、区域、群体作为整体,对专门研究单一民族的中国民族研究传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后,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格局最终确立,费先生也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系统总结了自己的民族学思想。文章开宗明义:“为了避免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我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⁶⁰界定了“国家民族”与民族共同体这些基本概念,而后进入主题,以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材料,论证“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⁶¹的形成过程,即说明了统一的中华民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强调了当下人们的主观意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是中国各民族整体认同的一种体现。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各民族的交流史。在中国历史上涌现过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和汉族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早在秦汉之际,中国便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而汉民族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多民族成分,形成的一个兼容并包的民族。当然,汉民族的这一雪球,通过文化的积累与认同,在历史的长河中,表现出特有的文化底蕴,滚出

57 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

58 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

59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费孝通文集(第七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02—203页。

60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61 同上。

了我们今天这一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的汉族。这一多民族的统一体，已存在了近两千年。不管是中原的汉族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建立王朝，都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这些朝代也都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和天下统一的问题。在中国这一沃野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有的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成长起来。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虽然曾经出现暂时分裂割据或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但都是短暂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不同的民族都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固然也冲突、对抗乃至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借鉴、吸收和互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民族文化再创造的动力和资源。如“茶马互市”、“盐茶互市”、“丝绸之路”、“和亲”、“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蒙古的藏传佛教”等。在这一多民族共生关系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进一步密切了多元一体的关系。即在汉族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形成一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最终整合出今天的中华文化。这一中华文化的基础，就是中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认同。分布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一方面是各民族自身的选择结果，另一方面是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的历史产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等用语，形象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这也是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体现。这一历史文化传统正是今天民族地区共同繁荣的现实基础。

从上看出，“民族”的概念从其产生起到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实践，都是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而“族群”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最早引入的西方人类学概念之一，随即与“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发生纠结，并引发了诸多争论。这种争论还在进行中。另一方能，关于族群的实证研究广泛开展，涌现出大量调查报告和民族志作品，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作为学术概念的族群具有极大的弹性，称其暧昧毫不为过，但也正是在“暧昧的族群”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对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思考，有着一定的学术意义。

最后，我想提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英文译名从原先的“The State Nationality Affair Commission”改为“The State Ethnic Affair Commission”。这一变化表明国家治理者已经意识到了“民族”的学理意义，“民族”概念的多重含义得到了普遍认可。